

2021 年第 6 期总第 46 期

财经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财经参考

2021 年第 6 期·总第 46 期

国际财经

大宗涨价：从“再通胀”到“类滞胀”-----	1
因果推断：利剑和 2021 诺贝尔经济学奖三剑客的故事-----	2
加密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发展-----	13

国内财经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成就与经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论）-----	15
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与自主创新-----	18
如何理解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	20
共同富裕靠什么-----	21

新闻快讯

7 年来最高！美国原油价格突破每桶 80 美元，通货膨胀或加剧！-----	24
9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 32006 亿美元-----	25
IMF 小幅下调 2021 年全球增长预测供应瓶颈阻碍经济复苏-----	26
外媒述评：美对华贸易政策仍举棋未定-----	27
市场化改革重磅举措落地电价“能涨能跌”-----	28
英媒报道：供应链危机冲击世界经济-----	30

财经参考

国际财经

大宗涨价：从“再通胀”到“类滞胀”

来源：财新网(2021-10-08)

作者：彭文生(经济学博士，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

“十一”期间海外能源商品价格显著上涨。我们发现，与今年 2 月相比，这轮大宗涨价受供给影响较为突出，比如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主要是供给短缺所致。这说明广泛存在的供给冲击已蔓延至能源领域。往前看，全球生产或将同时面对供应链瓶颈、劳动力短缺、能源供应弹性下降等多重约束。我们预计这将进一步增加协同生产的难度，加大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

供给冲击加剧，海外资产的定价逻辑也在发生变化。2 月大宗价格上涨反映的是“再通胀”(reflation)逻辑，而眼下市场更担心的是“类滞胀”。两者虽然都是价格上涨，但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由需求驱动，是经济良性循环的体现，有利风险偏好；后者主要由供给收缩所致，是经济受到负外部冲击的体现，不利风险偏好。具体来看：

本轮海外大宗涨价始于欧洲天然气。天然气是许多欧洲国家发电的主要原料之一，但这些国家又并非天然气生产国，需要从俄罗斯、挪威等地进口，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的比例高达 30%。三季度以来，俄罗斯遭受异常寒冷天气，国内天然气需求激增，加之工厂火灾等因素，使其对外供气受到限制。与此同时，挪威天然气工厂因为设备检修，供气受到约束，加上今年德国风力发电量不足，使得对天然气发电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加剧天然气供需矛盾。

从宏观数据可以推断出，欧洲天然气涨价主要是供给约束所致。以德国为例，7 月的工业生产指数为 94.8，比 2019 年同期低 5.5%；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 80.9%，比 2019 年同期低 1.6 个百分点。由于工业的能耗量远高于服务业，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二季度德国的用电需求比 2019 年同期更低。但由于风能不足，对天然气需求上升，而今年 1-7 月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总量为 1238 亿立方米，比 2019 年同期低 2.4 个百分点。其结果是，二季度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价格达到 15.3 美元/百万英热，是 2019 年同期的 5 倍。可见，供给不足（德国的风能和俄罗斯的天然气）是导致气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油价上涨的背后也与供给有关。一方面，OPEC 在 10 月会议上并未进一步提高增产预期。另一方面，今年美国页岩油扩产弹性下降，加上飓风的影响，加剧了市场对短期内能源供给不足的担忧。历史上，每当 WTI 油价升至 50 美元（对应布伦特油价约 55 美元）以上时，美国页岩油企业会有较强的扩产动机，一个证据是美国活跃钻机数会显著上升。但这一情况在今年并未发生。我们认为这部分与拜登上台后对化石能源行业的不友好政策有关。例如，拜登曾在其征税计划中提议，削减对传统能源企业的补贴，以此抑制化石能源、支持清洁能源发展。尽管征税计划尚未获得通过，但由此产生的预期或已对部分油企带来了负面影响。中长期来看，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在全球主要经济

体实现碳净零排放的目标下，煤炭和原油等化石能源的供给将持续下降。在预期影响下，美国页岩油投资和扩产意愿减弱，进而降低了原油供给。

市场如何看待本轮大宗价格上涨？从资产价格的反应看，这一次市场更担心“类滞胀”。今年 2 月，海外能源商品价格也出现过较大幅度的上涨，但当时风险偏好提升，资产价格呈现“再通胀”（reflation）交易的特征，即美债收益率上升，美股上涨，其中以道琼斯为代表的周期股涨幅更多。究其原因，当时美国疫苗接种刚刚落地，加上拜登政府 1.8 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即将到来，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大增。相比之下，过去两周风险偏好明显减弱，资产价格表现出“类滞胀”交易的特征，即美债收益率上升，美股回调，其中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成长股回调更多。这是因为，1）当前市场对疫苗的乐观预期已大不如年初，对疫情的讨论也从“何时实现群体免疫”变成了“如何与病毒共存”。2）市场对财政刺激政策的预期也没有年初那么强了。截至 10 月 7 日，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而拜登的基建计划和国会民主党人提出的 3.5 万亿美元的预算方案也面临阻碍。

我们预计，四季度美国将面临增长动能放缓、通胀保持高位、货币宽松退坡的宏观环境。随着供给冲击加剧通胀压力，我们预计美联储或将更加坚决地削减货币宽松。这是因为如果继续大幅宽松，可能会强化通胀预期，带来更大通胀风险。我们维持美联储将会在 11 月宣布、12 月开启 Taper 的判断。而在通胀没有消退之前，市场将继续担心美联储加息时点可能会提前（目前的预期是第一次加息或将发生在 2022 年四季度）。

另一方面，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将在四季度继续放缓。一来，尽管 9 月美国 ISM 服务业 PMI 表现尚可，但制造业 PMI 中的供应商交付指数进一步上升，表明企业补库存仍面临挑战。二来，过去两个月密歇根大学和咨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标同步走弱，或意味着随着财政补贴退坡、物价抬升，商品消费水平（尤其是耐用品）将会向长期趋势回归，增速将放缓。服务消费还有进一步修复的空间，但我们预计复苏的斜率也将因为疫情的扰动而变得更低，很难像再出现像二季度那样的报复性反弹。

因果推断： 利剑和 2021 诺贝尔经济学奖三剑客的故事

来源：财新网(2021-10-12)

作者：陈永伟(专栏作家，经济学博士、博士后)

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 18 点，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 和 奎多·因本斯(Guido W. Imbens) 共同获得这一奖项。和往年惯常的三位获奖者以相同比例分享将奖项不同，根据诺奖评委会的决定，卡德因其“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而获得了一半的奖项；而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则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而分享另一半的奖项。

不过，虽然诺奖评委会专门区分了三位获奖者的贡献以及获奖比例，但事实上，这“三剑客”的研究是有很多交叉的。卡德虽然是做劳动经济学的，但他用的方法主要是因果推断；而虽然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获奖理由主要是因果推断，但他们也都在劳动经济学的问题上有所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说这次诺奖其实就是颁给因果推断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么，因果推断作为一种计量方法，究竟对经济学有什么重要意义？在现在的经济学领域，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因果推断方法，它们又是如何被应用的？此次获得诺奖的三位究竟在因果推断领域作出

了哪些贡献，又会对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就让我们慢慢道来。

因果研究简史：从亚里士多德到鲁宾

作为万物的灵长，人类天性当中就包含了对因果关系的好奇。当看到一桩新事物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不禁地问：“这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在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长诗《天问》中，就围绕天地万物运行的因果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

在古人看来，因果关系是神圣的，具有极高的价值。据说，曾经有人问过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因果关系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位哲人的回答是，对他来说，一个因果关系的价值要胜过一个波斯的王位——尽管这个回答是出自一位哲人之口，但它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因果关系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因果关系对人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因此至少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因果问题的相关理论探究。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当中，就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把事物的原因分为了“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并提出了用枚举和归纳来推测因果的操作方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弗朗西斯·培根等学者则开始用归纳法来分析事物的因果。随后，约翰·穆勒则在自己的著作《逻辑体系》（注：中译由严复先生翻译，题目为《穆勒名学》）中对通过归纳确定因果关系的思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提出了五种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后来，这五种方法被学界统称为“穆勒五法”。由于穆勒本人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经济学界或许有权利宣称早在19世纪时，经济学人已经开始了因果问题的研究。

不过，和穆勒的讨论相比，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说，在穆勒时代，因果推断更多是一种基于哲学的探索，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因果推断则更多是一种统计上的努力。

在现代经济学中，曾经有两个和因果相关的理论先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前一个理论是所谓的“格兰杰因果”（Granger Causality）理论。这种因果理论关系的是两组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观察了几十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发现从收入的变化可以从统计上解释消费的变化，但反过来不行，那我们就可以说收入是消费的原因，但反之不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格兰杰因果”理论帮助其提出者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 J. Granger）斩获了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其在现实当中也有很多应用，但关于“格兰杰因果”究竟能不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学界是一直存在争论的。并且随着计量技术的发展，“格兰杰因果”已经在学界被逐渐边缘化。

后一个理论则是由统计学家鲁宾（Donald B. Rubin）提出的基于干预效应（Treatment Effect）的因果推断理论。而如果从思想上，这一理论的源头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前半期的著名统计学家耶日·内曼（Jerzy Neyman）。

1923年，当时还是华沙大学博士生的内曼就对因果问题进行过考虑。在他看来，所谓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基于一种“干预”（treatment）进行前后被干预对象表现的差别。比如，一亩地如果不用化肥，可以产五百斤的粮；如果用了化肥，可以产八百斤，那么这中间差的三百斤就是使用化肥这个“干预”所产生的因果效应。不过，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讲，要看一个因果关系的大小，就应该看同一亩地在施肥这个现实状态和不施肥这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状态下的产量对比。但是，一亩地怎么可能比较这两种状态呢？显然这就存在一个悖论。内曼提出的一个方案是，可以用对照试验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可以找一千亩地，随机地把它们分成两组，把其中的一组视为“干预组”（treatment group），另一组作为“对照组”（control group）。对于“干预组”的地，都施用化肥，而对“对照组”的地，则什么也不做。最后，研究者只需要对比“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平均亩产量，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因果效应。

应该说，内曼的方法是十分有建设性的。事实上，在他的方法提出后，就立即被很多学科采纳了。甚至在一直被认为不能进行实验的经济学领域，也催生出了实验的方法，而采用实验方法的迪芙洛（Esther Duflo）和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也已经在几年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这段故事，我们在先前的专栏当中已经进行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实验的方法可以在很多条件下帮助我们识别因果效应，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实验根本无法进行。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分析某种食物的致癌性，那么从理论上讲，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对照组”和一个“实验组”，让一组人吃这种食物，另一组人则不吃，然后比较这两组人的癌症患病率。但是，除了极少数的科学狂人之外，恐怕没有人会同意这个方案，因为它实在是违背了伦理。换言之，在现实当中，是否接受“干预”很难是一个随机现象。在这种条件下，直接比较两组人的表现就不再能直接表达出因果效应。以吸烟和癌症为例，有一种理论就认为，有些人之所以爱吸烟，就是因为含有某种基因，而这种基因本身就能让人更容易得癌症。因此，表面上看起来的吸烟导致的高致癌率，其实是因为这种基因所引起的。

基于以上原因，鲁宾在分析因果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内曼所建议的实验方法。不过，他保留了内曼关于因果效应的定义，认为它应该被定义为“干预”之后的实际状态与没有进行“干预”的“反事实”状态之间的区别。那么，怎么样才能计算出这两个状态之间的差别呢？他给出的方案是，如果可以创造一种环境，在控制一些因素后，让是否接受“干预”可以成为一种随机的事件，那么就可以通过比较接受“干预组”的平均表现和“对照组”的平均表现来获得因果效应了。或者更为通俗地说，尽管在现实当中，有时候我们没法进行实验，但是如果可以设法模拟出一个类似的随机试验环境，那么内曼的结论就依然是适用的。比如，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两组人，通过一定的分析，认定他们从事前看选择吸烟和不吸烟的概率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这两组人的癌症发病率来推断因果效应了。

鲁宾的因果推断框架一经提出，就立即引起了很多学科的重视。而经济学界显然是受到其影响最深的领域之一。在鲁宾之后，“因果推断”开始逐渐占领了经济学专业杂志，随后又开始逐渐占领了教科书，进而成为了显学。

因果推断的“五把剑”

现在鲁宾已经为因果推断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和框架，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将这个框架进行应用。换言之，就是如何去创造一个“干预组”和“对照组”独立于其他各种因素的环境。从现有的文献看，目前经济学家们比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五种：

第一种是“倾向性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这种方法的提出者，就是鲁宾和他的合作者保罗·罗森鲍姆（Paul Rosenbaum）。

这种方法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如前面说的，直接从“干预组”和“对照组”当中找出两组人来，保证他们事前选择是否接受干预的概率相同，然后对其表现进行比较。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两组人的各种特征对于是否接受“干预”的影响。比如，一个人是不是抽烟会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年龄、性别、财富、地位、工作等大量因素都会影响抽烟的概率。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每种因素的影响大小计算出来，最后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人抽烟的概率。随后，我们就可以把“干预组”和“对照组”当中概率近似的人分别拉在一起进行比较。比如，在两组人当中，都有一部分人从事前看有 70% 的概率可能吸烟，从事后看，确实吸了烟的人癌症患病率是 3%，而没有吸烟的人的患病率是 1%，那么这一批人当中，吸烟对癌症发病率的因果作用就是 2%。研究者可以重复以上过程，把所有概率的人都进行一个对比，得到很多组差值，最后把这些差值进行平均，就得到了我们所要的因果效应。

第二种方法是回归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如果要详细考察回归的历史, 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那位表弟高尔顿。事实上, 正是一些甚至不被他自己看好的研究催生了现代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回归。

要用纯文字介绍回归并不很容易, 但大致上讲, 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求解条件均值的问题。举例来说, 假如我们要对一个地区的房产价格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影响房产的因素很多, 地段、楼层、户型、面积都会影响房价。但作为研究者, 我们希望确切地知道, 如果给定其他因素不变, 其中的每一个因素究竟是怎么影响房价的。或者更为具体的说, 我们希望把房价表示成一个由各种因素影响的公式, 在每个因素前面, 都有一个数字, 它们都可以表示给定其他因素不变, 这个因素对于房价的影响大小。得到这个公式的步骤, 就是回归。

在统计当中, 实现回归的方法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最小二乘法”。很显然, 如果我们所考虑的每一个因素都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量, 而不受其他隐藏条件的影响, 那么回归就可以很好地控制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 通过观察我们关注的因素前面的系数, 就可以得到鲁宾意义上的因果效应。

第三种方法是所谓的“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这种方法是用来干预所谓的“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的。

如前所述, 在鲁宾的分析框架当中, 要求在控制了各种变量后, “干预组”和“对照组”在事前接受干预的概率是相同的。但在现实当中, 干预变量很可能受到某些不能观察的因素的影响, 因而即使控制了所有可以观察的变量, 我们也很难构造出一个鲁宾模型所要求的那个条件。这时, 我们就可以引入工具变量来进行干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需求曲线可能是经济学家最为津津乐道的模型了。需求曲线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模型, 它只是需求量和意愿支付价格之间的关系, 而一旦有了这个模型, 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各种“一顿操作猛如虎”, 得到很多结论。但是, 问题在于有人能确切说出一个市场上的需求曲线是什么样的吗? 有人可能说, 这个不难啊, 我们不是有市场的历史数据吗? 把所有时期的数据找来, 看一下每一个时期价格和市场销量的关系, 用回归得到一个公式不就行了吗? 但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原因很简单, 在现实当中, 我们看到的每个时期的销量都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我们就很难简单地把市场上的销量视为需求量。为了要把需求分离出来, 我们就必须要分离出供给的影响。

那么, 怎么从市场的销量当中分析出供给的影响呢? 一个方法, 就是寻找一个只会影响供给, 而不会影响其他因素的变量, 用它的变化来推测供给的变化。比如, 在渔市场上, 鱼的供给量是和天气密切相关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统计来得到这种关系。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一个历史时刻的天气状况, 就可以推测出每一个时间的供给曲线。如果我们熟悉供给模型, 就可以知道, 随着供给曲线的外生移动, 它会和需求曲线交出一个个的点, 而通过这些点, 我们就可以识别出需求曲线中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 而借助这个模型, 就可以知道每一单位需求量对于消费者意愿支付的因果影响。在这个例子中, 天气只会通过供给来影响销量, 因此它就是本模型其中的一个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是来自于原模型之外的, 但借助它, 我们就可以看清模型内部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在所有常用的因果推断方法中, 工具变量法可能是唯一一个由经济学家原创的。之所以说是“可能”, 这个方法的提出者据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菲利普·莱特 (Philip Wright), 他研究的是植物油的关税这样一个小众的领域。而碰巧的是, 他的儿子斯威尔·莱特 (Swell Wright) 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统计学家, 所以究竟这个方法是父子两人中的哪一个提出的, 本身就成了一桩悬案。据说, 最近有一些文献计量学家们通过研究表明, 菲利普·莱特是提出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这个结论为真, 那么经济学家就多少可以松一口气, 不至于在高举“经济学帝国主义”大旗的同时, 惊讶地发现自己才是完全被别的学科殖了民。

第四种方法是所谓的“倍差法”，或者“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方法其实是对控制实验法的一种拓展。如前所述，如果要想从一个控制实验中识别出因果关系，那么就需要保证“干预”选取的随机性，也就是要让“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表现事先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在现实中，干预很难做到这么随机，“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事先表现总会有一定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识别因果关系呢？一个办法就是，分别记录下干预发生前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两次差值，然后用干预后的差减去干预前的差。如果在干预前后，这两组对象之间差值的变化仅仅来自于干预活动的话，那么这个“差值的差”就是干预所带来的因果效应。

最早发现并应用“倍差法”的是公共卫生学家。早在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学家约翰·斯诺（John Snow）就用这个方法研究了饮水质量和霍乱之间的关系。当时，他猜测饮用水的不清洁很可能是导致霍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很难找到证据。巧的是，一个“自然实验”的发生为他研究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当时，伦敦的饮用水是由两个水厂供应的，而其中的一个水厂正好发生了搬迁，从一个水质较差的地区搬到了一个水质较好的地区。斯诺就利用这个自然实验的机会，记录下了搬迁前后两个水厂供水地区的霍乱发生率，并计算了相应的双重差分。通过分析，他就得到了水质和霍乱发生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五种方法是所谓的“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这个方法最早是由心理学家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和西斯尔维特（Donald Thistlewaite）共同提出的。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一个干预的发生与否，是和某一个指标的断点相关的。这时，我们只需要比较一下这个断点两边对象的相关表现就可以得到因果关系。

例如，我们是不是能上大学，能不能上重点大学，主要就是看分数。假设在某一年，高考录取线是500分，那么这个分数之上的人就可以上大学，而低于这个分数的就不能上大学。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中，高考分数是有很强的随机性的，考501分的人和考499分的人，水平很可能是难分伯仲的。因此，把断点两边的人对照起来看，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近似的控制实验环境。如果我们对上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感兴趣的话，只要比较一下这两个群体的人的收入，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好了，有了倾向性得分匹配、回归、工具变量法、倍差法，以及断点回归设计这五把“利剑”，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在实践当中将鲁宾的因果推断框架切实落地了。而在应用和发展这些工具的经济学家当中，这次斩获诺奖的“三剑客”毫无疑问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戴维·卡德：为哈佛打官司的经济学家

2014年，美国知名学府哈佛大学遭遇了一场飞来的官司。维权人士布卢姆经营的非营利组织SFFA提起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涉嫌种族歧视，并故意压低亚裔美籍学生的录取数量。布卢姆指出，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过度使用了“种族平衡”策略，并根据种族设立了录取配额。依据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案例，这被判定为违反宪法的种族歧视行为。

一旦指控成立，哈佛就可能招来高额的处罚，可谓兹事体大。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哈佛不得不认真应战。要打官司，当然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而要打这样一场涉及歧视的官司，哈佛就需要找一位具有足够资质的专家来论证，看似压低亚裔数量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某些因素解释的，并没有涉嫌歧视。但是，这个论证应该请哪个专家来完成呢？很多人认为，哈佛本身就是经济学重镇，有大量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个重任应该是由某个本校的学者来完成吧。但出人意料的是，哈佛最终是请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卡德，也就是此次诺奖的第一位“剑客”来担任专家证人。卡德也确实不负众望，写出了一份近200页的报告，对哈佛招生的合理性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并用经验证据对布卢姆进行了有理有利的驳斥。不久前，法院已对这个案件作出了判决，法官认定，在招生过程当中，哈佛并不存在原告所指控的歧视现象。哈佛能得到这个结果，卡德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或许有人要问，哈佛这么一个名校，为什么放着本校这么多知名教授不请，非要专门去请卡德出山？我想，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来是哈佛本校的老师毕竟有利益冲突，要避嫌；二来是，对于这类案件，卡德或许本来就是最为合适作为专家证人的了。事实上，如果要讨论歧视等劳动力市场的问题，那哈佛还真可能找不出名头上能和卡德匹敌的学者。

卡德 1956 年出生于加拿大，1978 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83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任教。此后，他先后辗转于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哈佛等顶尖学府，并最终“落户”伯克利，随后执教至今。从研究领域上看，卡德是一位标准的劳动经济学家。在劳动经济学的重大问题，比如最低工资、教育回报、移民，以及歧视等问题上，卡德都颇有建树。1995 年，他曾经以自己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贡献，获得过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贝茨·克拉克奖。

在卡德所有的研究当中，最为有名的一个应该是他和已故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合作的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在经济学界，最低工资制度一直是保守争议的。尽管最低工资的倡导者们一直强调这个制度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保障，但很多持自由放任观点的学者却一直对此表示反对。比如，在华人世界非常著名的张五常教授就一直将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法斥为是恶法，并呼吁废除它们。为什么放任派的经济学家这么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呢？原因是他们认为，这可能带来失业率的增加。其逻辑很简单：当最低工资增加时，一部分企业就需要以更高的成本来雇佣员工，这就会让它们减少雇佣。最终，市场上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了，这个减少就会带动失业的增加。根据这个逻辑，最低工资虽然可以保障一部分人的权益，但是它事实上是以牺牲了其他人的就业权益为代价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它可能是不合算的。

尽管经济学界围绕着最低工资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但在大多数时候，相关的争论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现实中的最低工资究竟会不会产生人们所担忧的提升失业率的后果，这一点其实一直都不能被证实或者证伪。为什么呢？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讲的因果推断问题。从理论上讲，实施最低工资法，就是对一个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一次干预。如果要考虑这个干预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有干预的现实情况和没有干预的“反事实”情况，但显然，这两个情况不可能同时存在。

因此在现实中，所谓的经验研究也只能根据某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法出台前后，就业率的变化来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但很显然，这些证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在干预发生前后，有很多因素都变了，它们都可能影响就业率，其中最低工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能谁也说不清。直到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出现，这个问题才得到了一个比较确定的解答。

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是基于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完成的。1990 年代初，新泽西州的最低小时工资从 4.25 美元提高到 5.05 美元，但与此同时，与新泽西州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则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动力市场就分别构成了“干预组”和“对照组”。卡德和克鲁格分别搜集了新泽西的最低工资法出台前，两州的快餐店雇佣状况，以及其他一些劳动经济学家们关心的变量。很显然，由于两州的情况是有差别的，因此这些变量在事先就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新泽西的最低工资法出台后，这个差异就发生了变化。根据我们在上一节中的讨论，这个“差值的差”，就可以视为由最低工资法所带来的因果效应。

卡德和克鲁格发现，最低工资法的实施让新泽西快餐店的平均工资显著增加了，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失业率上升。这个证据表明，最低工资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要比理论预计来得小得多。由于这个发现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当时劳动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因此即使卡德和克鲁格本人也对此表示了惊奇。随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试图找出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并得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当企业遭遇最低工资制度后，可以通过更高的价格将增加的成

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它们并没有必要减少雇佣。另一种解释是，如果有企业主导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它就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将工资保持在最低水平。此时，最低工资的增加就会激励更多的人参加工作，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在供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最终的均衡就业数量就可能是上升的。

在卡德和克鲁格的以上研究发表之后，立即在经济学界引起了震动。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它动摇了最低工资有负面影响这个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长期认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引入了一次方法的革命。从此之后，“倍差法”这个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被使用了两百年的方法终于进入了经济学，从此之后，即使有学者要再和卡德争论最低工资问题，他恐怕也不得不采用类似的办法了。

卡德的另一个研究是关于移民的。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移民问题在这个移民国家却是十分敏感的。很多美国人认为，新移民的到来，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挤占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类似的观点对美国的联邦和州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问题是，这些关于移民影响的直观认识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在很长时期内，似乎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卡德以另一个“自然实验”为切入，再次祭出了“倍差法”这把利剑。历史上，古巴曾经和美国长期处于十分紧张的关系，卡斯特罗当局一直都禁止本国居民移民到美国。但在1980年4月，古巴政府却出人意料地松动了这个政策，允许有移民意向的本国居民自由移民。政策调整之后，从当年5月到9月，就有12.5万名古巴人移民到美国。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选择定居在了迈阿密。这一冲击导致迈阿密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大约7%。很显然，古巴移民政策的调整，以及移民对于居住地的选择，就天然地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的机会——受到移民冲击巨大的迈阿密就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干预组”，而受到移民影响较小的几个邻接地区则可以被视为是“对照组”，对这两组之间利用“倍差法”，就可以得到移民增加对各种经济变量带来的因果效应。

卡德先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了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由于移民可能影响的主要是本地的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所以卡德将关注的主要点集中在了他们身上。结果发现，尽管迈阿密市的劳动力供应大幅增加，但其对受教育程度低的迈阿密居民没有负面影响。与其他地区相比，工资没有下降，失业率也没有增加。很显然，这个发现打破了很多人对移民问题的传统认识。

卡德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来自于教育质量的回报。长期以来，教育质量究竟会给受教育者带来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教育质量会对人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教育质量的短期影响是存在的，这种影响也会随着时间衰退。但是，如果想要对以上这个争论进行实证考察，却会面临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人们所说的“教育质量”究竟是什么？它究竟能用什么指标来进行量化？第二个困难是，在研究收入和教育的关系时，可能遭遇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很容易进入到好的学校，但他们即使不去好的学校，也会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赚到更多的钱。因此，我们即使看到了有人上了好学校，然后找了好的工作，也不能在上好的学校和找到好工作之间建立因果关系。除了以上两个困难之外，由于教育和人的职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时间间隔，其中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也会对相关的研究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为了克服以上困难，卡德和他的合作者克鲁格一起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了防止陷入空谈，他们先是将教育质量量化为了学生与教师的人数比、学期长度，以及教师平均工资等指标，并构造了相应的数据库。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处于同一劳动力市场，种族、收入水平一致，但接受教育的时间、地点不同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变化。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很容易知道，他们的这种努力，其实是在努力构造一个模拟的实验场景，以尽可能消除除了教育质量之外，其他因素对人们的长期收入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发现，学校资源不仅可能对人的未来产生影响，而且其效应是十分显著的。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的类似工人当中，那些接受过更高“教师密度”教育

的人，将在未来取得更高的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卡德对于劳动经济学的贡献毫无疑问，但他的很多研究事实上是和克鲁格一起完成的（事实上，安格里斯特的很多研究也是和克鲁格合作的）。如果不是克鲁格前几年因为自杀身故，那么他应该有很大概率会和卡德一起获奖。

安格里斯特：功夫经济学家

第二位“剑客”是约书亚·安格里斯特。他于 1960 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从他的名字，我们就不难猜测到，他是以色列裔。1982 年，22 岁的安格里斯特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毕业。此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并先后于 1987 年和 1989 年获得该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安格里斯特曾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从 1994 年开始，他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现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安格里斯特曾经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例如，2011 年，他曾经获得过冯·诺伊曼奖，而在 2013 年，他则被汤森路透评为“引文桂冠奖”。

在今年经济学诺奖的三位得主当中，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至少在中国，应该是这样。这不仅因为他曾经几次来过中国讲学，更是因为他和皮斯克合著的两本关于因果推断的教科书——《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和《精通计量学》（Mastering Metrics）都已经成为了经济学系的学生们学习这一领域的最重要参考书。从这两本书的编排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业余生活中是小说《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忠实读者，以及一名中国功夫迷（注：“基本无害”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一书中的梗，而在《精通计量学》一书当中，他则把学习计量经济学比作了修习功夫，并用了大量《功夫熊猫》当中的梗）。由于安格里斯特学术水平过硬，又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所以在学生中口碑甚好。在中国学生圈里，很多人都喊他叫做“安神”。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安格里斯特的学术生涯，那就是关于因果推断方法的各种使用。事实上，在我所能想到的安格里斯特的论文当中，几乎都是用因果推断来分析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而且和很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总能别出心裁，玩出新意。从研究议题看，安格里斯特的主要领域还是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尤其是和教育相关的议题，更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下面我们就挑几个例子，详细地介绍一下“安神”究竟怎么耍功夫，把研究变得有趣。

第一个例子是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多读书到底可以带来多大的回报？”在劳动经济学领域，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教育经济学家雅可比·明瑟（Jacob Mincer）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大量的探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明瑟收益率”（即多受一年教育所能带来的收入增加）的概念。当时，受到计量工具的限制，明瑟的研究大多是直接采用回归的方式进行的，即在控制了工作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变量之后，直接看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但是，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这种研究思路是有着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的。

在现实当中，一个人受教育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并不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变量，相反，它会受到很多难以度量的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个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就可能影响孩子的受教育水平，而这种影响因素是很难被用可见的尺度度量的，因此在回归当中也就很难被控制。既然这些因素都不能被控制，那么鲁宾模型所要求的实验环境就很难达到，我们也就很难通过简单的回归来进行因果识别。

面对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呢？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工具变量，它是一个外部的变量，只能对受教育时间产生影响，但不直接影响收入。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变量，我们就可以借助前面介绍的“工具变量法”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了。但问题是，究竟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工具变量呢？这样的问题当然是难不倒“安神”的。在和克鲁格合作的一篇论文当中，他找到了一个神奇

的工具变量——人们的生日。

为什么生日能作为受教育时间的工具变量呢？其根本原因就来自于美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根据美国的义务教育法，所有年满6周岁的学龄儿童，都必须在该年的9月份入学接受教育。并且只有当年满16岁的时候，学生才有权选择辍学离开学校。在这个规定之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出生时间不同的孩子，入学年龄和受教育的时间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一个孩子如果出生的月份早，那么他在入学的时候，平均年龄就会比较大；而如果出生的月份比较晚，其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就会比较小。具体来说，如果孩子出生在第一季度，那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平均岁数大约是6.45岁，而如果孩子出生在第四季度，他们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则只有6.07岁。而他们被允许辍学的年龄却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不同时间的孩子最终都选择辍学，则出生月份较晚的孩子所必须接受的教育就会比出生月份较早的孩子来得多。极端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个1月1日出生的孩子和一个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如果两个人最终都辍学，那么后一位必须接受的教育将会比前一位多上近一年。

有了这样的特征，那么出生时间就具备了称为工具变量的资格了。显然，它会影响人们的受教育时间，但不会直接影响收入或者其他的什么量。这样一来，通过工具变量法，就可以考虑教育时间对收入的影响了。通过以上分析流程，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发现，给定其他因素，额外1年的教育，将会让收入会增加9%——这充分说明，多读一年书，对人的未来发展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情况可能是这样。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班级规模影响的研究。究竟是大班教育好，还是小班教育好，这在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领域都是一个争议多年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更为小班化的教育将会显著提升教育的质量；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小班化的教育除了浪费教育资源外，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或许有人会说，检验这么个问题还不简单？直接找一批在大班接受教育的学生，再找一批在小班接受教育的学生，比一比他们在各种表现上的差别不就可以了？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在现实当中，进入大班的学生和进入小班的学生显然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那些能够进入小班接受教育的，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本身资质也比较好的学生。如果直接把这两群人的各种表现来进行比较，那么与其说得到的是班级规模的因果效应，不如说是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效应。

那么，“安神”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事实上，读者如果仔细看了前面的介绍也应该很容易想到答案——就是用录取分数这个断点。由于小班在很多时候都被认为是精英化的教育模式，因此很多时候孩子要想进入小班进行学习，就必须经过考试并达到一定的分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分数线就可以成为是否接受小班化教育这个干预的一个“断点”。和前面讨论的一样，我们只需要比较断点两边对象的相关表现，就可以得到小班化教育的影响。利用这一思路，安格里斯特和几位合作者进行了很多研究。结果都表明，小班化确实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当班级变小后，孩子的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上升，由此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比如在一项研究当中，他发现如果把班级的规模从22人减少到15人，就可以获得5.5%的内部回报率。应该说，从经济角度看，把班级做得小而精一些，或许是更为有利的。

第三个例子是家庭劳动供给问题。近年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微观化，而家庭结构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就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很显然，如果家庭的结构不同，其对于劳动力的供应也会出现不同。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家庭选择了“二胎”，那么从直观上看，相比于不要“二胎”的家庭，这个家庭将更有可能选择减少对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因为这个家庭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孩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更多的孩子会成为更少的家庭劳动力供给的原因呢？这倒未必。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家长们选择生几个孩子，以及选择是不是上班这两个决策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他们相互交织，很多人之所以愿意生“二胎”、“三胎”，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更重视家庭，不愿意

多工作。再这种情况下，要确立孩子数量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么怎么解决以上的问题呢？“安神”给出的答案还是找工具变量。这次，他找到的工具变量更为神奇，是头两个子女的性别。他认为，对于家长来说，头两个孩子的性别，对于家长是不是决定继续生孩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头两胎就实现了儿女双全，那么家长多半会很满意，从而就此作罢。但如果是同一性别，那么家长可能会觉得有缺憾，一定要继续生孩子以补齐儿女双全。因此，这就可以被用来作为子女数量的一个工具变量。利用以上思路，安格里斯特考察了子女数量与家庭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中的女性将有可能减少劳动力供给。但是，对于不同女性来说，这种效应是不同的，相比于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这种效应在受过高教育的女性身上就不是那么的显著。很显然，这个研究的结果说明，传统的基于性别的家庭分工目前依然是存在的，但是教育的普及很可能在未来打破这种传统。

奎多·因本斯：因果推断领域的探索者

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位“剑客”奎多·因本斯是一名荷兰裔。1963年，他出生于荷兰的格德拉普（Geldrop）。1983年，他从荷兰的伊拉斯谟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先后进入了英国的赫尔大学 and 美国的布朗大学求学，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年博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哈佛大学执教，直到1997年离开。此后，他相继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欧洲大学学院访学。2006年，他再次回到了哈佛大学，并在此执教6年后再度离开。从2012年至今，他一直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虽然按照诺奖委员会的安排，因本斯此次是和安格里斯特一起由于在因果推断方面的成就而分获一半诺奖，但坦白说，这两位学者在研究风格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在相当程度上，安格里斯特是在“玩”因果推断，是在用别人发明的工具实现自己有趣的设想；而相比之下，因本斯则是在“做”因果推断，是在把因果推断的相关理论不断完善化，让它们变得更加实用和可靠。

需要说明的是，因本斯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其研究的领域绝不仅仅限于因果推断领域。例如，笔者在博士期间，就曾经在高级统计学课上仔细学习过他关于广义矩估计（GMM）以及经验似然估计的两篇论文。尽管这两篇论文讲了什么，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记得老师告诉我们它们是在相关领域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除了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外，他在非参数估计、贝叶斯统计，以及限定变量的回归等问题上，都有很多的贡献。我想，如果要全面归纳因本斯的贡献，那么这些工作也应该要算上。

具体到因果推断的领域，我想，因本斯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现有的方法进行合理的解释。比如，我们前面讲到，莱特父子很早就发明了工具变量法，而在后续的发展当中，经济学家也早已对这一方法熟练应用了。但是，在鲁宾的因果推断模型在经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如何将早已有的工具变量法重新纳入到这个分析框架当中，用新的框架对传统的方法进行重新解释。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因本斯和安格里斯特专门合写了一篇论文，把工具变量的选择和应用重新解释为了在鲁宾的框架下，构造一个对比实验环境的过程。然后又在此基础上重新推导了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时经常用到的“两步回归法”。通过这些工作，工具变量法就被成功地纳入到了鲁宾的分析框架当中。

二是对已有的方法进行完善。因果推断作为计量方法，在实践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时候，作为“裱糊匠”的计量经济学家们就需要挺身而出，对方法进行修补，让它们可以更好地在现实当中被应用，而作为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因本斯显然没有少干类似的工作。

一个例子是对于倾向性得分匹配的完善。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种方法的大致思路，就是先用是否接受干预对研究对象的各种特征进行一次回归，从而找出各种因素对接受干预概率的影响，然后对每个观察对象都计算出一个“倾向性得分”。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中“倾向性得分”相近的对手的表现来计算因果效应。这个思路看起来很直观，但在具体应用时却有难度。举例来说，在一些情况下，观察对象是相对较少的，而可能影响是否接受干预的因素却很多。这时，第一阶段通过回归来确定影响因素，进而计算“倾向性得分”就会有技术上的困难。对于这个问题，因本斯在一篇论文当中进行了讨论，并通过调整协方差的办法对此进行了克服。

三是对现有的方法进行拓展。应该说，鲁宾给出的分析框架，以及经济学家们现在运用的各种工具都是相对简单的，很多时候，这些工具都不足以成功应付复杂的现实。这时，计量经济学家就需要对已有的工具进行拓展，以帮助经济学家们完成相关的分析。举例来说，在经济分析中，经济学家们除了分析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平均因果效应外，还经常关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某一分位数上的影响。

比如，在考察收入分配时，我们可能会关心如果出口增加一个单位，会对收入处于下20%分位数上的人群的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过去的实践当中，经济学家已经发明了所谓的“分位数回归”来处理这个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分位数回归用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回归分析，也很难套用鲁宾的因果推断框架。不过，在进行“分位数回归”的时候，它也可能会遭遇所谓的内生性问题，也可能需要用工具变量。在这个时候，工具变量应该怎么用，结果应该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就都涌现了出来。而在一篇论文当中，因本斯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从而比较好的把工具变量在分位数回归当中的应用，以及相关的注意点说明白了。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大数据时代，因本斯非常注意将机器学习等新方法吸收到因果推断的框架当中来，帮助改进因果推断的质量。举例来说，传统上，一个经济学家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十分困难的。而在大数据时代，依靠机器学习的思路，人们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工具变量——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一下子能找到很多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用机器学习的手段才能更有效率地找到我们要的工具变量，面对多个工具变量的时候应该怎么进行取舍，就都成了问题。而因本斯和其夫人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就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说到这里，我想就不得不花一点时间说几句因本斯的太太，她就是经济学界著名的天才级女性苏珊·阿西（Susan Athey）。如果读者的记忆力足够好，应该记得去年介绍米尔格罗姆的时候，笔者曾提到过这个名字。是的，她就是米尔格罗姆最为骄傲的学生。和一直坚守学术圈的因本斯不同，阿西对现实中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并曾亲自到微软等大型平台公司任职。我想，因本斯会对机器学习等新的工具感兴趣，并把它们应用到自己熟悉的领域，恐怕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他这位贤内助吧。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因本斯和阿西相互切磋经济学知识一事本身是一个家庭内的信息交流，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领域的信息交流可能会带来技术进步这个事实。

因果推断和经济学的未来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因果推断现在已经在经济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至少在微观领域，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辩驳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当学者们不断地将机器学习和因果推断这两大领域相结合之后，因果推断对于经济学的统治将会越来越坚固。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很多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模棱两可、争议不断的问题或许都可以通过因果推断的方法来加以检验，从而给出评判。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给出了疑虑，因为在因果推断带动实证经济学取得繁荣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取得明显的发展了。现在的经济学博士生用的，依然是马斯克莱尔的微观经济教材，以及萨金特的宏观经济教材，和二十年前完全一样。这就是说，在这二十年内，理论界并没有产生巨大的突破。这究竟是说明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臻于完美，只需

要通过实证加以印证，还是说明了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我们当然承认因果推断等实证方法的作用。但如果我们从本质上思考一下因果关系，就可能感到细思恐极。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事物之间的因果其实无非是我们的理性通过知性的范畴，对几个现象之间进行的重新组织。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的心中有一套什么样的理论，组织起来了什么样的范畴，得到的就可能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具体到经济学，无论是哪一种因果推断模型，其最终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的设定的，而如果依据的理论不同，设定就不一样，最终得到的因果效应也就可能不同。

德国哲人康德曾经说过：“我们在事物上先天地认识到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放进事物的东西”。如果我们已经不再把理论放进事物，而只是借助于现有的框架来认识事物，那么依靠更多的数据，更好的工具，我们就能更好地认识经济现象吗？对于这一点，我是怀疑的。基于这一点，我更希望现在方兴未艾的因果推断可以作为经济理论发展的推进器，而不是被用来彻底替代理论的地位。或许只有这样，整个经济学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加密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发展

来源：FT 中文网 (2021-10-15)

作者：陈敏兰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

加密货币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焦点话题。无论是在交易大厅还是在餐馆，有关以太坊或 Solano 加密货币的讨论似乎都不绝于耳。不过，大部分讨论都聚焦于比特币和其他代币的每日价格波动上，而更值得关注的则是分布式账本技术 (DLT) 的兴起。

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听起来并不特别陌生，这已带来了相当明显且广泛的影响。如果双方能在无需担忧验证、征信或信托的情况下进行匹配和交易，那么谁还会需要机构作为中介人的角色？这将能显著节省成本和时间。

分布式账本技术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金融行业。我们认为，具有成本效益且基于规则的 DLT 网络将为新的交易类型、新的商业行为和模式打开大门。普华永道的预测显示，DLT 的广泛采用有望在未来十年为全球 GDP 带来逾 1 兆美元的增长。

分布式账本技术可能有何应用？

金融行业最有望受益于 DLT 驱动的颠覆性科技，在效率极低、交易量相对较小、价格透明度有限且高交易价值的市场中，相关应用已开始崭露头角。作为金融专业人士，我们已见到该技术被运用于私募市场、银团贷款、衍生品和贸易融资等方面。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处于核心地位，以可程序化设计的智能合约可自动触发或有支付 (contingent payment)，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尤其是对小型企业而言。在新兴市场或先驱市场 (frontier market)，这可能会令 Excel 表格无用武之地，甚至是纸质分类账簿也可能告终。在恰当的运用下，DeFi 有望降低金融摩擦并为缺乏银行服务的客群扩大服务管道，进而说明解决不平等问题。

我们预计区块链技术还将改善交易完成后的服务速度和成本，例如结算、托管、股票借贷和抵押品管理等。数字智能合约能将复杂的多步骤财务请求视为单一任务，并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自动处理，而无需进行多次交易（每次交易都存在执行风险）。

区块链有助于改善供应链韧性和库存管理，并扩大物联网连接的采纳和使用。医疗保健、公共服务、艺术品和奢侈品都有望受益于 DLT 在数据所有权、身份验证、来源追踪和记录管理方面带来的变化。

监管机构要禁止加密货币吗？

各国立场不一。中国是第一个全面禁止使用比特币的国家，也不太可能是最后一个。尽管监管目标和力度因各国国情而异，但任由加密货币发展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

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一直最为严厉，陆续出台的监管措施对加密活动的各个方面予以打击。9 月底，中国央行和其他九部委宣布加密货币相关业务和挖矿活动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外加密货币交易所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也将被视为非法活动。

相比之下，美国对加密货币的立场较为温和，政府和国会议员的看法不一。上周，美国证监会主席加里·詹斯勒（Gary Gensler）将稳定币比作赌场筹码，据报导称美国财政部正考虑对这些资产进行更直接的监管和限制。而美联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夸尔斯（Randal Quarles）和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则指出允许私人部门创新所带来的机会。稳定币的增长速度和传统金融机构对加密货币的稳步采纳似乎确实使得监管介入更趋紧迫。

与其他经济体一样，新加坡也寻求对其境内运营平台上的加密货币活动加强监管和追踪。该国 2020 年实施的监管框架吸引了传统金融机构参与到加密货币市场中。主要的加密货币企业也进入该国，不过违反当地规则的平台可能会面临处罚和停业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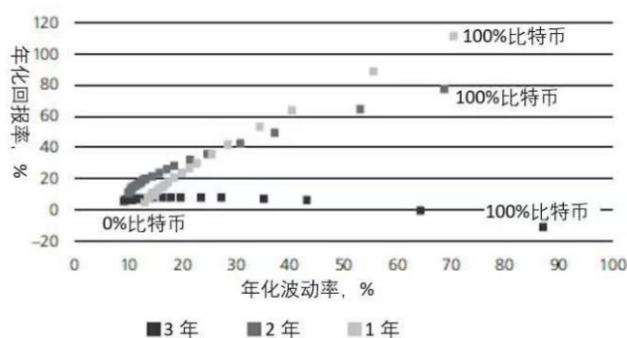
加密货币有损地球生态环境吗？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比特币是最初的加密货币，其采用工作量证明（proof-of-work）机制（激励用户小区采用并参与）。但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电力，造成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并随着比特币的采纳及市值上升而不断增加。digiconomist 的数据显示，比特币的年化碳足迹约为 7900 万吨，约为新加坡 2019 年排放总量的两倍。

以太坊的年化碳排放量约为 3500 万吨，但随着其转向对生态影响相对较小的权益证明（proof-of-stake）模式，这一情况料将有所改善。目前，在大多数加密货币投资资金所涉及的活动中，生态足迹和治理风险仍远超偶尔的正面社会影响。

对于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者而言，加密货币的生态成本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投资的主要阻碍。

只有在价格涨幅足够快的情况下，加密货币才有助于投资组合多元化



注：具有比特币敞口的投资组合的年化回报率和波动率。

我们对三个样本期使用月度对数回报率：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3 年），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两年），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1 年）。投资组合每月进行再平衡。

资料来源：瑞银，彭博，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投资加密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

多数人最初是被加密货币的价格飙升和财富暴涨所吸引。实际上，许多加密货币的程序设置在本质上是通缩性质的，对早期采用者予以奖励。在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下，我们已见到严守纪律的股票投资者也步入该领域，在知之甚少且前景及应用皆不确定

定的代币项目承担较大的曝险。

实际上，对加密货币和代币的直接曝险仅适合于风险承受度较高的投机型投资者。

价格剧烈波动可能导致交易速度极快，也可能造成财富永久损失。潜在投资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加密货币价格没有合理的估值模型来进行预测。我们无法明确断定加密货币是便宜还是昂贵，更不用说价格会上涨还是下跌。此外，历史数据表明，比特币并不能为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波动或通胀提供有效避险。

把握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增长潜力还有更佳的方式。我们认为构建基础设施的部份赋能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以及能够在行业内运用 DLT 的平台公司存在价值。后者尤其具吸引力，现在就采用 DLT 的企业有望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增长。

对于有意配置在加密货币的投资者，应首先检视其投资组合是否已布局于更成熟的另类资产。比如，已经配置私募股权、风险投资或避险基金了吗？在押注下一个狗狗币之前，投资者可先考虑这些风险回报特征更好的资产。

国内财经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成就与经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论)

来源：人民网(2021-10-12)

作者：张勇(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局长)

核心阅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做好经济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一百年来，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的目标和任务，提出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方针和政策，指导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工作。回顾总结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成就与经验，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领导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我们党坚持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明确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赢得革命胜利创造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提出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现在，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党领导经济建设积累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一百年来，我们党不断健全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积累了成功开展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历史经验证明，成功推进经济建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有效应对一些西方国家对我遏制打压，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时代答卷。实践证明，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执行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经济规律。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依据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进入新时代，我们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开展经济建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实践表明，制定经济政策不能脱离国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经济规律。

坚持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制定正确的经济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重要判断对于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统筹发展和安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加艰巨复杂，无论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必须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解决“卡脖子”问题，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大国经济的内在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实现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良性互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实选择。

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我们党在推动发展中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整体地而不是零散地把握发展规律，分析内在机理，处理发展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要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坚持系统观念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生动体现，对于

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培养、引进和使用大批优秀经济人才。我们党从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人才，包括重视培养、凝聚和使用经济人才。党的十九大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强调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成为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这对于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坚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一战线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回答了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坚持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从1953年开始，我们党编制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这些规划（计划）既坚持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既符合长远发展目标和国家整体利益，又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需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中央通过制定五年规划（计划）建议，将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方略、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化为宏伟蓝图；国务院编制五年规划（计划），将党中央的规划（计划）建议具体化、机制化，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进而将其转化为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行动的方案，推动国家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不断前进。

推动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推动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就能看清长期趋势，把握经济规律，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实现各项既定目标。

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要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让人民更多更好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发展成果，以中国新发展为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与自主创新

来源：爱思想网(2021-10-06)

作者：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仪式隆重举行。落成庆典之后，在以“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为主题的庆典论坛上，北大国发院六位创始教授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分别做了现场或视频分享。本文根据创始人之一林毅夫教授的股份整理。

特别高兴能够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者注：北大国发院的前身）创始的五位老朋友再次同台，来谈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时，目标非常明确，希望引进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做贡献。

从1994年中心创立至今的27年，中国经济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如果仔细看这27年，包括再往前看1978年以来43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采取的转型方式并不是按照我们学到的西方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讲的——转型要成功，就必须市场化，价格全部放开，国有产权必须私有化，政府必须是有限，国家的责任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推动自由化。经济转型要成功，这几项改革必须同时到位，这一转型思路被认为是当时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

中国从1978年到现在一路走来，推行的是一个渐进的、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既保留了国家干预，也放开了市场准入。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就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刚成立时，学界认为中国这种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得比计划经济还差。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通过这种转型方式取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而且，其他在转型中取得稳定和较快发展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以及更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也都是被当时整个理论界认为是最糟糕的渐进转型方式。遵循当时被认为最好的转型方式的苏联、东欧、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则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作为知识分子，需要思考为什么当时的认识跟后来的实际发展有那么大的差距。

想起来引进的经济学理论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是必然的，我们引进的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理论又是如何得来的呢？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总结，例如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对16-18世纪英国和欧洲经验的总结，李嘉图、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也是对他们所处时代欧美经济现象的总结；另一种是对旧理论解决不了的新问题的原因探索和解决方案，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无法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来解释和解决，所以凯恩斯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应对，形成了凯恩斯主义。

任何理论必然是很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揭示成功或问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可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制度变量都非常多，所以理论的构建必然经历“抽象”和“舍象”的过程，找出这个经验或问题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把它抽象出来保留到理论模型中，其他

的社会经济变量则被舍象，存而不论，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那些被舍弃的变量如果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例如，从亚当·斯密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供需如果发生波动，自己会恢复均衡。其实它有个暗含前提，即经济中供给和需求大致平衡。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经济受到一点冲击，需求减少了，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后需求就会增加，供给需求就会恢复均衡，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发生大萧条，30%的人失业，经济存在严重不均衡。失业的人没有收入，即使价格下降，需求也不会增加。有就业、有收入的人，面对价格下降，会多消费吗？也不会，因为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失业。因此，原来认为的市场自动均衡的力量就不存在了，所以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直接创造需求，来使经济恢复平衡。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大部分的失业问题已经解决，过剩产能已经被消化，如果再继续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当然就会出现所谓滞胀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就被新的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

既然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有暗含前提的，在发达国家理论的暗含前提变化时，原来的理论会被新的理论取代，那么，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尽管对于我们开拓眼界和思路有帮助，但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社会等各种结构必然和发达国家不同，前提条件存在差异，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理论，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就会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如果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家希望以理论来贡献于国家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像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大师一样，首先看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形成可以解释这些成功经验的理论；或者，看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可用的条件和办法，提出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以理论贡献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通过上述方式形成的理论不仅有助于中国，也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二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跟中国有同样的愿望，希望能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但实际上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七十多年，三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事实：第一，成功实现追赶发达国家愿望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数量非常少；第二，那些少数成功的经济体，他们推行的政策在当时的主流理论看来是错误的。

比如，中国的渐进双轨转型很成功，和中国一样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也都是渐进双轨转型，那些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则都失败了。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当时的主流理论主张用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发展现代化工业，但都没成功。少数成功的“东亚四小龙”则都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产业做起，这种模式起初也被认为是错误的。

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也同时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这是因为理论都是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如何判断一个理论贡献的大小呢？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世界的经济中心必然在中国，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就会是最重要的理论。在了解中国的现象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此，根据中国的现象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可以贡献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可以贡献于民族复兴的需要。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条件接近，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也会有帮助，因此，也可以贡献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如何理解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

来源：爱思想网(2021-10-10)

作者：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充分认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取得新进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确立“小康”目标接续推进，人民生活质量和共享水平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对共同富裕道路作了新的探索，对共同富裕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对共同富裕目标作了新的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针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提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部署：“十四五”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完整勾画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间表、路线图，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又顺应了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彰显了党的初心使命，必将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奋斗。

促进共同富裕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内涵

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促进共同富裕规律的认识，共同富裕思想不断发展，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目标，表明我们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纵观 500 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也将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一些发达国家搞了几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把人民生活总体上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不仅没有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整体迈入现代化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将彻底改写人类社会高收入国家的版图，在整体上极大提升人类福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促进共同富裕与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起来，不断筑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为人类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启示。

准确把握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坚持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越过1万美元大关，但仍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没有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共同富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才能更广泛地激发全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才能更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更持久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要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拿出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往前推进，一步步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目标要求和战略部署。同时，也要深刻汲取一些国家超出发展水平搞过度福利化、导致公平效率不能兼顾、影响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的深刻教训。要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具备的条件下，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那些有能力和条件办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好，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吊高胃口、不搞“过头事”。

坚持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一体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在缩小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坚持及早着手，有序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要把总目标分解为阶段性目标，把每个阶段的任务分解成一项项具体任务，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快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促进共同富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要打攻坚战，更要打持久战。

共同富裕靠什么

来源：财新网(2021-10-12)

作者：尚鸣(中信改革发展研究会资深研究员、经济导刊杂志副总编审)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后，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很大反响，各方面解读和建议也很多。从共同富裕政策路径到具体实施方案出台，做出详细部署需要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在浙江进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验，走的是先试点再推广的路径，在制度设计与政策上是积极稳妥慎重的。特别是社会上出现不同解读声音后，中央财经办负责人适时释疑，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搞“杀富济贫”，自愿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既不是金字塔顶尖上少数富人的富裕，也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中间收入阶层占社会大多数的“橄榄型”富裕社会。共同富裕，说到底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的核心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对城镇居民来说要搬掉“新四座大山”，解决好看病难、上

学难、养老难、住房难的问题；对乡村农民来说，巩固好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之后返贫，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一是立足于“做大”蛋糕。富裕靠什么？靠发展。共同富裕首先要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物质支撑，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懈奋斗，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啃下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硬骨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高质量发展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通过高质量发展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夯实“家底”，厚植共同富裕的基础，让人民群众不断增加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有可能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的人员群体。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大约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占比较低，仍属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力争2035年达到7亿人，2049年超过10亿人，形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结构，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助力扩大内需消费，形成内部循环，进而带动外循环，推动新发展格局渐成；助力中国实现稳定健康的长期发展，达成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一是中等收入群体购买力强，是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的主力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根基。二是当中等收入群体者占社会的主体，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只占少数时，就能把可能出现的“被平均”问题减到最低限度，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三是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弥合社会摩擦裂痕，凝心聚力保持社会和谐，对社会能起到稳定器作用。由此可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措施，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三是着力解决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大，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地理上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直观地展示出两侧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现在确立共同富裕的目标，重点要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目前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既面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较低等老问题，又面临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对收入分配的新挑战。紧扣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坚决推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促进城乡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失衡问题，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近年来，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层流动通道逐渐堵塞，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新四座大山”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年轻人焦虑不断蔓延，类似于社畜、打工人、996、内卷等字眼或新闻在中国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共鸣，归根结底是对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的不满。因此，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践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在持续扩大全社会财富总量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为中心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要素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政策力度和精准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遏制以垄断或

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获得的收入。从政策和导向上，加快推出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举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走上“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

四是分好“蛋糕”，核心靠发展。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怎么分配？在政策设计上，还是要以发展为主，以改革推动发展，以开放促进发展，以创新引领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得再大一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现在，我们仍要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中心，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把“蛋糕”分好。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以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要把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举措，着眼于把“蛋糕”分好。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中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单一的政策举措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过去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做大蛋糕是首要问题，“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那时粗放式增长尚可容忍，现在吃饱饭了，蛋糕做大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好，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把蛋糕切得更好，完成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愿望。十年前，广东与重庆围绕做蛋糕与分蛋糕有过争论，实际上，最终还是以做大蛋糕为主。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十年前仍十分相似，从衡量衡量居民收入差距常用指标基尼系数看，2000年以后中国基尼系数快速上升，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一个历史高值0.491，2010年前后一系列政策出台，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于0.4。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仍在0.47—0.49之间，国外和一些民间机构测算多在0.5或0.6以上，明显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线0.4，高于同期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曾发布研究文章称，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接近于美国。进一步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要坚持通过发展经济、辛勤劳动、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五是靠科技创富，靠勤劳创新致富。科技创新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驱动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拥有发展的主动权，国际上没有核心技术的优势，就没有政治上的强势。一定程度上说，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核心技术的竞争，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抢得先机，谁就能拥有持久的竞争力。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被“卡脖子”，这是我们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半导体企业，市场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芯片严重依赖国外，供应链的命门就掌握在别人手里，就会像中兴通讯一样受制于人。只有将关键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要以关键性技术、前沿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才能把产业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赢得国际竞争。现在我们人均GDP1万多美元，要提到3万—5万美元，这个过程只能靠科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也要靠科技创新，中国的发展最终肯定要走到创新引领的路径上来。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共同发力，夯实共同富裕的“平台根基”，厚植共同富裕的“创新要素”，激发共同富裕“的创新驱动力；需要鼓励共同奋斗，勤劳致富、创新致富，这是根本途径。要聚焦国家长远发展需求，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构建支撑

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强化责任意识，弘扬科学精神，摒除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既要只争朝夕，又要脚踏实地，坚定自信、潜心研究，努力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原创性成果。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

六是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按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标志着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仍存在着产业基础脆弱、就业不够稳定、政策性收入过高、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东部不少地区“一日千里”的发展相比，西部有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刚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他们的致富之路还很漫长。接续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好易返贫致贫人口的监测工作，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对脱贫人口要扶上马送一程，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压紧压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各层级政府的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新闻快讯

7 年来最高！美国原油价格突破每桶 80 美元，通货膨胀或加剧！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网(2021-10-12)

责编：李泽东

央视新闻 10 月 12 日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地时间 10 月 11 日报道，美国原油价格于 11 日达到每桶 80.52 美元，为 2014 年 10 月 31 日以来的最高水平。自 2020 年 4 月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40 美元以来，美国油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飙升了 120 美元。

美国汽油协会（AAA）的数据显示，11 日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创下 7 年来的新高，达到每加仑 3.27 美元，仅过去一周就上涨了 7 美分。自 2020 年 4 月触底至每加仑 1.77 美元以来，汽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的出行需求大幅下降，油价也大幅降低。而今年随着美国人的出行需求恢复，汽油供不应求，造成了美国的油价持续上涨。

CNN 在报道中写道，高油价会加剧通货膨胀，而全球目前面临的能源危机很可能会继续推高汽油价格。

另据央广网 10 月 10 日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消息，自 2021 年 10 月 9 日 24 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分别提高 345 元和 330 元，燃油车的用车成本将进一步上升。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 10 日 0 时迎来今年以来第 13 次上涨，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 345 元、330 元，折合升价 92 号汽油、95 号汽油分别涨 0.27 元、0.29 元，这也代表着国内成品油迎来了年内最大幅度涨价。而本次调价是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的第十九轮调整。

对于广大车主来说，出行成本将有所增加。卓创资讯分析师徐娜分析：“此轮零售价格上调落实后，私家车加满一箱 50 升的油将多花 13.5 元。物流方面，以月跑 1 万公里、每百公里油耗 38 升的重卡为例，未来半月内用油成本增加 532 元。”

本次油价调整过后，国内成品油价将呈现“十三涨，三跌，三搁浅”的格局。与年初相比较，有车一族加满一箱 50 升的 92 号汽油需要多花 66.5 元。

能源专家、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表示，近段时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背后有多种因素。首先，供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从高峰下滑，全球经济恢复及原油需求增长态势良好，原油价格不断提升。

董秀成分析指出：“需求方面，随着疫情好转、经济复苏，交通运输活动量变大，拉动了消费需求。供给侧方面，一方面是‘欧佩克+’会议机制在起作用，控制原油产量。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一些大型能源公司在石油方面的投资也在减少。这里有疫情的原因，也有对未来的预判和投资减少的因素，所以产能建设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

平均来看，本轮调价周期，伦敦布伦特和纽约 WTI 油价分别比上一调价周期上涨 7.48%、7.03%。截至 9 月最后一周，受飓风袭击的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仍有 16% 的原油生产处于关闭状态。此外，“欧佩克+”会议仍维持每月 40 万桶/日的小幅增产额度。多重因素叠加，国际油价持续上涨。

董秀成表示，除了供需矛盾，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第一个原因是美联储货币发行量太大了，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影响了价格变化，因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越多当然价格就变高。第二个原因是金融炒作的情况也比较明显，华尔街等投资和金融机构在期货市场上‘看多’原油期货。”

数据显示，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 80 美元，达到 2018 年 10 月以来的高点；纽约 WTI 原油期货价格创 2014 年 10 月以来的高点，两市油价今年以来累计分别上涨 62%、67%。董秀成表示，要警惕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原油是大宗商品，我国 70% 多是进口，原油价格上涨有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因为油价上涨，PPI 可能就会上涨，通过一系列市场传导，可能导致 CPI 上涨。”

综合国内外多家相关机构分析和预测，国际油价今年四季度可能会保持涨势。受到天气以及国际天然气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未来国际原油价格甚至可能会飙升到每桶 90 美元。”

9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 32006 亿美元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10-08）

作者：张莫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10 月 7 日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006 亿美元，较 8 月末下降 315 亿美元，降幅为 0.97%。业内人士表示，9 月外汇储备规模减少，主要由估值因素导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韧性持续显现，外汇储备具有长期稳定的基础。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2021 年 9 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

涨，主要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数据显示，货币方面，9 月，美元汇率指数上涨 1.7%至 94.2；非美元货币中，欧元下跌 1.9%，英镑下跌 2.0%，日元下跌 1.1%。资产方面，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下跌 0.9%；标普 500 股票指数下跌 4.8%，欧元区斯托克 50 指数下跌 3.5%，日经 225 指数上涨 4.9%。

展望下一阶段，王春英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表示，从趋势上看，过去几个月外汇储备都稳定在 3.2 万亿美元左右，每月都是受汇率折算、资产价格变动、投资收益的影响小幅波动。现在既没有热钱涌入，又没有资金流出，外汇市场供求是基本平衡的，考虑到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情况，外汇储备能够维持在大约 3.2 万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备保持稳定的基础。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不平衡、不均衡因素较多，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可能进一步增加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我国要做好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继续大力提振内需，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冲击的准备。

IMF 小幅下调 2021 年全球增长预测 供应瓶颈阻碍经济复苏

来源：路透新闻网 (2021-10-13)

作者：路透新闻部

路透华盛顿 10 月 12 日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周二下调了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化大国的增长前景，并表示持续的供应链中断和物价压力阻碍了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的复苏。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将 2021 年全球增长率预测从 7 月时的 6.0%下调至 5.9%，并维持 2022 年增长率预测在 4.9%不变。

“不过，整体上微小的调整，掩盖了对一些国家的大幅下修，” IMF 在报告中写道。“由于疫情形势恶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前景已经黯淡了许多。这次下调也反映出发达经济体群体的近期前景变得更为艰难，部分是由于供应链中断所致。”

全球制造业活动受到半导体等关键零部件短缺、港口堵塞和集装箱紧张以及劳动力短缺等因素的冲击。在去年大流行导致的停产之后，为提高效率而优化的全球供应链难以恢复正常。

在一定程度上由富裕国家过多储蓄催生的供需错配已经推高了物价，引发通胀飙升。IMF 预测明年通胀率将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但警告称，持续的供应中断可能使通胀预期失控。

****美国增长放缓****

美国在这些影响中首当其冲，IMF 将其 2021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预测从 7 月预估的 7.0%整整下调

了一个百分点，降至 6.0%—7 月的预测增速被视为 1984 年以来最强劲速度。

IMF 表示，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萎缩，因为它的预测假设美国国会批准总统拜登提出的 10 年四万亿美元基建和社会支出计划。议员们现在正试图就一个规模较小的方案达成共识，而 IMF 表示，大幅缩小方案规模将削弱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增长前景。

在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会议开始时发布的这份报告还削减了其他工业经济体的增长预测。对德国的增长率预测比 7 月份的预测降低了 0.5 个百分点，降至 3.1%。对日本的增长率预估下调 0.4 个百分点，降至 2.4%。

IMF 对英国今年的增长预测只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降为增长 6.8%，使其成为 G7 经济体中最高的增长率预测。

对中国 2021 年的增长预测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至 8.0%，IMF 称公共投资支出的回落速度超过预期。对印度的增长预测则保持不变，为增长 9.5%，但由于疫情恶化，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前景已被削弱。

IMF 将“东盟五国”（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增长预估下调 1.4 个百分点。

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长预估被温和上修，因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疫苗鸿沟****

报告还警告称，“疫苗鸿沟”加剧了经济前景的危险分化，因为低收入国家的 96% 人口尚未接种疫苗，面临着更为长期的低增长和愈发严重的贫困问题；同时通胀预期也有脱离目标的风险。

“预计 2021 年极端贫困人口将比疫情前的预测增加 6,500 万至 7,500 万，”报告指出，并称低收入国家需要约 2,500 亿美元的额外支出，用于抗击疫情并使经济重回疫情前的增长道路。

IMF 表示，目前预计这些国家明年的累计经济产出将比疫情前低 6.7%。同时发达经济体 2022 年产出将比疫情前水平高出近 1%。

外媒述评：美对华贸易政策仍举棋未定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1-10-07)

责编：郭庆娜

参考消息网 10 月 7 日报道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10 月 5 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10 月 4 日称，要以新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一方面，戴琪表示，她将寻求与北京进行新的谈判。另一方面，美国拟批准将某些中国进口产品排除在关税之外。

报道称，戴琪的讲话受到美国贸易团体的广泛欢迎，不过它们也批评，在结束征收关税以及扩大美国公司的贸易机会方面缺乏明确的路线图，这些关税打击了美国公司和消费者。

戴琪在今年 3 月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上任后的几个月间，美国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华贸易政策的评估。因此，本周日这场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活动备受瞩目，舆论认为戴琪的讲话可能标志着拜登政府开始处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

另据俄罗斯卫星社莫斯科 10 月 5 日报道，美国将开始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部分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日前做出此番表态。她同时不排除对中国采取新的限制性措施并启动所谓“新的调查”。

报道称，特朗普掌权时的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特朗普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两年内对几乎所有自中国进口商品都征收了高额关税。特朗普在 2020 年 1 月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与中国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拜登接任美国总统后，给人的印象是，华盛顿似乎已经忘记了贸易协议。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政策演说时表示，华盛顿准备取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以减轻美国制造商的负担。此外，戴琪还声称，如有必要，美国准备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对中国加征关税和启动所谓“新的调查”。

报道认为，她演讲的最终意思可以归结为：我们会做一些小小的放松，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些，我们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和中方谈谈。如果这在拜登担任总统的一开始就说出来倒不奇怪，但经过 9 个月的密集贸易政策审查，竟得出如此粗糙的结论，听起来很不令人信服。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首先，拜登政府想要在国内支持取消关税和喜欢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群体之间取得平衡。其次，拜登政府想对中国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另外，拜登至少还需要表态做一些与特朗普略有不同的事情。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政策。”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10 月 6 日也发表文章指出，不论鹰派还是鸽派，之前都对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一就拜登政府对华贸易议程发表的演讲期待已久。到头来两边都感到失望。未来一年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仍是维持现状，即冻结冲突。

文章称，戴琪没有宣布加征任何新关税或启动什么“新调查”，而是保留了各种可能性，她说拜登政府打算执行特朗普任内中美两国通过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过，戴琪也未提及取消现有关税。她确实宣布了一项新的关税豁免程序，经由该程序，在关税被认为破坏性太大的领域，美国企业可申请豁免。特朗普政府时期有过类似的程序，但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到期了。

文章还称，拜登政府无疑会因为意识形态色彩不够鲜明而同时遭受鹰派和鸽派的批评，但戴琪的路线不无道理。现在按兵不动，可以赢得时间来平息美国盟友的不满，并最终协调确定一种更加有效的策略。此外，被指对华立场偏软的拜登政府既可以通过保持现有关税来化解这种具有政治破坏力的指控，又能为未来的谈判保留筹码。

文章指出，鉴于拜登政府在国内和国外已是分身乏术，很难说现在是发动一场新贸易战的绝佳时机。美国正在努力应对供应链受阻和价格上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拜登的经济议程目前面临的重大威胁不是中国，而是通货膨胀，以及推高通胀的与疫情相关的生产中断。

文章认为，除非通胀形势发生变化或者发生其他意外情况，导致对华政策被更广泛地颠覆，否则拜登政府目前可能会保持中间路线。

市场化改革重磅举措落地电价“能涨能跌”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1-10-13）

作者：汪子旭，王璐

《经济参考报》记者 12 日获悉，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四项重要改革措施,提出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将市场交易电价浮动范围扩大为在基准价基础上,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则不受上浮20%限制;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市场,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真正建立起“能涨能跌”的市场化电价机制,是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利于缓解当前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困难,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对全国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总体影响有限。从长远来看,将推动电力市场加快建设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燃煤发电电量、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市场

根据《通知》,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上网电价。同时,《通知》还要求各地要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目前尚未进入市场的用户,10千伏以上的用户要全部进入,其他用户也要尽快进入。

上述负责人表示,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市场,同步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将进一步增加电力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扩大交易规模,有利于推动电力市场加快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建立起“能涨能跌”的市场化电价机制,可以更加充分地反映电力供求变化,加快确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

近年来,电价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实施多年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各地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由市场形成价格。上述负责人介绍,“基准价+上下浮动”市场化电价机制的实施,有力推动了电力市场化进程,2020年超过70%的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上网电价。

“今年以来,全球能源行业出现新的变化,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常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影响。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发电行业平稳运行,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并着眼长远推动电力市场加快改革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上述负责人说。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浮动范围 高耗能企业不受上浮限制

除了推动燃煤发电电量、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市场,《通知》还要求,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浮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电价更好反映电力供需形势和成本变化,改善燃煤发电企业经营状况,激励企业增加电力供应,抑制不合理用电需求,改善电力供求状况,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据介绍,近期煤炭价格明显上涨后,多个地方的电力市场交易中燃煤发电市场交易电价已出现上浮,对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耗能行业无序发展会增加电力保供压力,不利于绿色转型发展。”上述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 限制，同时严禁各地组织开展电力专场交易，改革实施有利于引导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实现相对更多的上浮，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成本上升压力，抑制不合理电力需求，改善电力供求状况，并着眼长远推动企业加大节能技改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小微企业等用电享阶段性优惠 居民农业电价稳定

此次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对于其他工商业用户和居民、农业用户用电成本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其他工商业用户而言，用电成本占总成本比重总体较低，在当前电力供需偏紧、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电价可能出现一定上浮，企业用电成本会有所增加。”上述负责人表示，据测算，全国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占总成本比重平均约 1.3%，此次改革最多可能推高约 0.15 个百分点，总体影响有限。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减轻用户负担。同时，将继续落实好已出台的一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对于居民、农业用电，《通知》则明确保持价格稳定。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用电和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改革实施后，居民、农业用户将和以往一样购电用电，方式没有改变，电价水平也保持不变。”上述负责人解释称。

《通知》要求，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改革平稳落地。其中包括，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建设，有序放开各类电源发电计划，健全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培育合格售电主体。同时，加快落实分时电价政策，建立尖峰电价机制，做好市场交易与分时电价政策的衔接。此外，避免不合理行政干预，加强煤电市场监管。

英媒报道：供应链危机冲击世界经济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1-10-04)

责编：张威威

参考消息网 10 月 4 日报道 据英国《卫报》网站 10 月 2 日报道，一切都曾进展顺利。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将推动全球经济的后疫情复苏，股市回到了创纪录的高点，物价的上涨刚好足够让通货紧缩担忧成为过去。

但是，最初让圣诞树下是否有足够数量 PlayStation 游戏机打上了问号的供应紧张，正在摇身演变成一场涉及能源、劳动力以及从利物浦到洛杉矶的运输能力短缺危机。

报道称，所有这些问题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后疫情消费需求的飙升纠缠在一起。但是集合到一起，它们有可能导致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所谓的会导致世界经济脱轨的“滞胀风”。

保险业巨头安联保险公司顾问、剑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穆罕默德·埃里安说，世界经济可能在价格仍然迅速上涨的情况下出现衰退，这样的末日双重打击在上世纪 70 年代几乎让英国一蹶不振。

他说：“供应链问题的持续时间会比大多数决策者的预计长得多，尽管企业并不感到那么意外。

各国政府将不得不迅速作出反思，因为供给侧、运输、劳动力这三个因素正在纠集到一起，刮起一股遍及全球经济的滞胀风。”

报道指出，能源短缺正在提供这一问题的最显著例证：英国有越来越多的加油站无燃油可供，而当西方的圣诞节前需求即将达到顶峰之时，亚洲一些城市却不得不拉闸限电。

报道称，在全世界展开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争夺之际，不少国家都因为没有足够的能源而陷入困境。石油价格已经在 12 个月的时间里几乎翻了一番，达到每桶近 80 美元。

报道指出，加上在越南等一些制造业大国持续实施的新冠疫情相关限制，以及被广泛报道的诸如计算机芯片等零部件的短缺，工厂完全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

报道称，由于缺乏半导体部件，8 月份英国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27%，导致出口到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汽车数量大幅减少。9 月 30 日，由于芯片供应问题，大众集团、福特公司和生产欧宝汽车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宣布在德国实施新的临时停工措施。欧宝公司将关闭一家工厂至 2022 年——这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工厂关停。

据报道，在日本，制成品库存指数已经下降到了 2011 年地震和海啸灾难之后从未出现过的水平。

但是报道指出，即便工厂能够弄到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并能制造出更多产品，运送产品仍然需要耗费更高的成本。衡量集装箱运费的德鲁里航运指数与一年前相比上升了 291%。一些繁忙航线——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过去一年里集装箱的单位运费已经上涨到原来的 6 倍。

报道还指出，供应链问题并不会在货物抵达航运港口时结束，劳动力短缺成为产品前往它们最终目的地的日益崎岖旅途中的最后一道难题。欧洲许多地方或因围绕劳动待遇的争端、或因持续的疫情限制而引起的卡车司机短缺正在导致运输延误。